

运河论坛

# 实干笃行 把“愿景图”变为“实景图”

本报评论员 刘大福

时代潮流，圣域咸祥。12月16日，市委十四届十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济宁市委关于制定济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系统谋划了济宁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充分体现了中央要求、省委部署、时代特征、济宁特色和群众期盼，目标任务清晰、思路清晰可循、任务明确可为。

《建议》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紧紧围绕“三大定位”“七个高地”“十个强市”等目标任务，一以贯之推进强市建设，是指导我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张蓝图里，既有加快迈向现代化城市、二〇三五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的“大目标”，也有打造宜居宜业民生幸福高地充满民生温度的“小心愿”，既是行动纲领，更是用心用情

将百姓所期望变成现实的庄严承诺。目标已经确定，蓝图已经绘就。接下来的关键是如何把“愿景图”变成“施工图”和“实景图”。

要科学把握发展大势，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切实把济宁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为全省发展大局多作贡献。要坚定扛牢“走在前、勇争先”使命担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主动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等国家、省重大战略，大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持续擦亮“孔孟之乡、运河之都”等品牌，突出建设新型工业化强市、北方内河航运中心、世界文化旅游

名城“三大定位”，集中力量办好“济宁的事”。

要抓好“谋”与“干”。把“愿景图”变成“施工图”、进而变成“实景图”，关键在实干、关键靠落实。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打造新型工业化示范高地、产业科技创新高地、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现代港航物流高地、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高地、宜居宜业民生幸福高地“七个高地”上加大突破，全面提升制造业、教育强市、科技强市、人才强市、数字强市、交通强市、金融强市、农业强市、文化强市、旅游强市等“十个强市”建设水平，在全省区域副中心城市建设上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建成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取得决定性进展。

要坚守为民初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坚持人民至上，牢牢把握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着力稳就业促增收，加快建设教育强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健康济宁建设，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路虽远，心向前；事虽难，必躬行。坚定扛牢“走在前、勇争先”使命担当，拉高标杆、对标一流，改革创新、锐意进取，以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步伐，扎实做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我们一定能够把“愿景图”变为“实景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中，书写出更加浓墨重彩的篇章！

来稿摘登

## 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

王志雨 秦家璇 李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指明方向，确立了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根本遵循。我市作为“孔孟之乡”和山东省基层治理创新试点城市，依托党委社会工作部体制改革，构建起组织引领、服务凝聚、作用转化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其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推广意义。

强化组织保障，夯实党建引领治理根基。我市以党委社会工作部组建为契机，率先实现市、县两级社会工作部门全覆盖和实体化运行，构建起“市委统一领导、社会工作部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协同推进、区县具体落实”的治理格局，为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奠定坚实体制基础。我市制定《关于加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一年打基础、两年创品牌、三年建体系”的阶段性目标，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与民生保障、产业发展深度融合。针对群体流动性特点，创新“流动党员双向管理”机制，通过企业与社区党组织共管实现“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任城区万达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等特色载体，让分散群体“找得到组织、融得进组织”。

坚守为民初心，凝聚新就业群体共识。我市通过精准化服务供给、全方位政治引领、特色文化浸润，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关爱体系，实现从“管理对象”到“服务对象”的理念转变。开发线上服务平台小程序，集成诉求反馈、技能培训等功能，实现24小时响应、7日办结的闭环服务。线下整合党群服务中心等资源，建成暖“新”驿站，联动“友好商户”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便民服务。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党员教育培训体系，依托党校阵地开设专题培训班，实现碎片化学习全覆盖。同时，深挖儒家文化资源，打造“学”志愿服务品牌，市级层面组建行业志愿服务队伍39支，惠及群众45万余人次，成为城市精细治理的“暖心帮手”，通过读书角、文化宣讲等浸润职业素养，实现文化认同与职业自觉的双重提升。

推动角色转化，激活基层治理参与动能。新就业群体角色转变的核心在于搭建参与平台、健全激励机制、发挥独特优势。我市打通多元渠道搭建参与平台，赋予新就业群体“社会工作观察员”“兼职网格员”等身份，打破治理二元对立。成立新就业群体联合会，建立与社区、物业、企业的“四方联动”机制。推动机制激励保障作用发挥，建立积分管理办法，将治理参与情况与服务兑换、荣誉表彰挂钩。同时，建立“群体+社区+部门+企业”协同机制，破解电动车乱停放等治理难题，提升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党校 本文系济宁市党校系统2025年课题项目“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济宁市实践的分析”（项目编号：2025JN31））

## 让运河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

贾方方 李华

运河，不仅是流淌千年的水利奇迹，更是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流动史诗”。从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的漕运盛况，到各地运河支流滋养市井的烟火日常，它以水为脉串联起燕赵的豪迈、齐鲁的厚重、江南的温婉，在舟楫往来中促成地域文化的多元交融，沉淀出兼容并蓄、务实进取的精神内核，成为镌刻着民族记忆的文化瑰宝。

在当代语境下，传承运河文化绝非对历史遗迹的静态陈列，而应是让千年文脉“活”在当下的创造性转化。这首先需要筑牢“物理根基”，以精细化保护守护文化载体。无论是北京通州的古运河码头、江苏扬州的东关古渡，还是我市的运河总督署遗址，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遗存，都是运河文化的具象表达。通过科学修缮古桥、漕仓、船闸，运用数字化技术建立遗址档案，既能留住运河的“形”，更能让后人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更重要的是，要激活文化“精神内核”，让运河故事与新时代同频共振。文化传承，关键在于让当代人尤其是年轻群体产生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可以将运河元素融入文创设计，让漕运图纹化作时尚单品，让运河诗词走进沉浸式剧场；也可打造特色文旅IP，推出“运河研学”路线，让游客在亲身体验中聆听漕运历史，在探访运河古镇时感受民俗风情。同时，借助短视频、纪录片等媒体形式，用年轻化的表达解读运河背后的治水智慧、商贸文明与家国情怀，让文化传承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寻”。

运河文化的持久生命力，更在于与现实发展的深度融合，实现“保护—传承—发展”的良性循环。如今的运河，早已超越单一运输通道的属性，成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文化纽带。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契机，整合沿线生态、文旅、产业资源，既能让文化遗产释放经济价值——如浙江杭州依托运河打造的文创产业园区，带动就业与消费；也能以文化凝聚力打破地域壁垒，促进沿线省市在生态治理、文旅联动、产业协作上形成合力，让运河从“历史遗产”变为“发展动能”。

从千年前的“漕运命脉”到新时代的“文化动脉”，运河的流淌从未停歇。让运河文化“活”起来，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赋能。唯有以创新思维守护文化根脉，以时代视角挖掘精神价值，才能让这条千年运河在新时代继续奔腾，成为滋养民族精神、赋能区域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岁月长河中续写新的文明篇章。

（作者单位：任城区融媒体中心）

声音广场

## AI课，别偏离素养培育

张盖伦

今年秋季学期以来，全国多省份全面启动中小学AI（人工智能）通识教育。AI走进中小学课堂，既有利于培养能适应未来社会的现代公民，也有助于为国家储备科技创新的人才火种。不过，一些地方的AI课程在实践中出现变形走样，需要引起重视。

比如，有的AI通识课虽冠以人工智能之名，但老师授课时只是简单介绍AI概念或技术，重知识传授，轻思维训练，忽略了AI课程实践性、探究性强的学科特性。有些AI通识课在设计上缺乏连贯性和层次性，没能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适应不了学生的真实需要。还有一些地方出现功利化苗头，把“AI教育”变成了“AI竞赛教育”，大搞拔尖选拔，盲目鼓励参赛、考证。

课程走样背后有现实原因，胜任AI教育的师资力量不足是重要因素。尽管目前针对中小学教师AI培训不少，但覆盖面仍然有限，系统性和深度也不足。从调研数据看，接触过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中小学教师凤毛麟角。此外，AI课是“强资源依赖

型”课程，需要学生观察、实践、总结，他们要写代码、设计机器人、部署本地模型，但并非所有学校都能提供相应的硬件设施和实验环境。同时，一些培训机构渲染焦虑、推波助澜，把学AI与升学加分联系起来，使课程偏离了素养培育的轨道，加重了学生负担，反而可能扼杀他们对技术探索的兴趣。

不妨从师资建设、课程设计、观念引导等方面破局。在师资上，可建立“高校+企业+学校”协同培训机制，借助社会力量补上师资短板。在课程上，应摒弃知识灌输的老套路，根据不同年龄特点采取不同教学方式，让孩子们自己动手做实验、写代码。在观念上，需明确推行AI通识教育是要培养适应智能时代的未来人才，不能走功利化的老路。

AI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具备AI素养，正成为一种基本能力。发展中中小学AI教育，目的就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国家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守住素养培育的初心，才能让青少年更加从容地走进人机协作的未来。

（12月22日《人民日报》）



时值年末，一项关键民生数据传递出积极信号：1月至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42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由9月的5.2%回落至10月的5.1%。这一成绩，是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取得的，彰显了我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更是一系列稳就业、促就业政策协同发力的生动体现。未来，需继续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推动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让广大劳动者好就业、就好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华峰 漫画/文）

理论经纬

# 在作者与文本之间

——吴淇“以意逆志”说与新批评“文本细读”的跨时空对话（下）

刘直轩

（续上）（三）鸿沟：目的指向的根本不同

虽然二者在部分理念认知和实际批评操作上存在诸多相似，但必须始终清楚地认识到二者在文学批评的本质理念上是存在根本性不同的。吴淇的终点是“作者”，文本细读是手段，目的是渡向彼岸的“古人”之志”。他的批评实践是通过文本细读，把握作者之“意”，逆推作者之“志”。

而新批评的终点是“文本”，文本细读本身就是目的，意义在于语言结构内部的复杂关系。他们坚决反对“意图谬误”，即将诗的意义等同于作者创作时的意图是一种谬误，他们认为，作者的意图既不可考，也与文本的客观价值无关。“诗一诞生，就脱离了作者，属于公众世界。”他们在批评实践中做的是通过文本细读，揭示文本内在的张力与结构。这是中国文论传统阐释学与现代文论理论之间的根本鸿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吴淇的理论：吴淇的“就诗论诗”并非后世意义上的“文本中心论”，它是一种“作者中心的文本细读”，是维持作者意图论框架下的更为客观阐释学。它不同于完全不顾文本、只凭感性空谈或过度考据的批评，它也不同于完全斩断文本与外部作者联系的西方现代文本中心论。而其伟大之处在于，在坚定维护“探求作者本意”这一传统目标的同时，他极具创见地将阐释的锚点从读者和外部历史考证转移，又牢牢地钉在了文本自身之上。这使得他的理论在客观上与后世的文本细读方法产生了深刻的联系，成为中国古典文论中一朵提前绽放的、注重客观分析的理性之花。

三、在中国文论谱系中的坐标

吴淇对“以意逆志”这一古老学说的新阐释所蕴含的学术智慧，是承前启后的。要弄清其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坐标位置，应该对吴淇之前文学批评习惯，同期清朝考据学派批评风格以及在其之后可能受到其学说影响的学术观点进行分析。

（一）吴淇之前：以己意说诗

在吴淇之前，尤其是汉宋诸儒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虽然不会完全抛开文本纯粹凭自我情感感受进行评论，但文本常常沦为批评者观点“佐证”而非“依据”，其独立性和整体性被严重忽视。在吴淇所批判的“以‘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的模式中，阐释者的“己意”是主导，这里的“己意”，通常是预先设定的哲学、政治或道德观念，而文本则被工具化。这产生了两个在文学批评中绝对忌讳的严重问题，其一是断章取义，其二是牵强附会。

首先是断章取义的问题，断章取义是指截取诗歌中的只言片语，来证明自己已有的观点。《诗经》汉儒注疏中此种问题大量存在，在此举一例：《关雎》本是一首爱情诗，但《毛诗序》断言：“《关雎》，后妃之德也。”阐释者带着“后妃之德”这个先入为主的“己意”，去解释诗中的每一个意象。“雉鸣”成了“攀而有别”的道德象征，“荇菜”成了“贞洁”的隐喻。文本的字句还在，但其整体的情感、意象和艺术生命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值得注意的是，单就《诗经》而论，吴淇并不反对加入道德义理方面的解读，主张“声歌义理，合一交重”，且他自己也直言：“《三百篇》圣人论定，是当信而后论者，何也？《三百篇》以道为主，而文与理附焉。即本序所谓‘孝敬之集式，人伦之师友’，所费其文以披论其理，其理愈明，其道愈显也。”由此可见，至少在他看来，经典的“志”本身即蕴含了深厚的“道”——如“孝敬之集式，人伦之师友”。因此，他的方法论关键在于“因其文以披论其理”，即义理的阐发必须严格地以文本（文）为依据和出发点。据此反观汉儒注疏，我们或可提出一种更辩证的评价：汉儒的问题在于其阐释方法时常脱离了文本的严格约束，从而在过程中破坏了对诗歌“意”的完整感知，而吴淇的贡献，正是试图用文本的客观性来匡正这种阐释的随意性，以期“其理愈明，其道愈显”。

其次是牵强附会的问题，将文本没有的含义强加于其上，尤其是进行政治隐喻式的解读。比如对李商隐《锦瑟》的解读。这首诗意境朦胧，情感深邃，本身就是一首开放的审美文本，完全可以只注重文本本身带给我们的如梦似幻的审美体验。但历代注家纷纷以“己意”揣测其“志”：有说是写给名伶“锦瑟”的侍女的，有说是哀悼亡妻的，更有说是影射牛李党争、自伤身世的。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他们会“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等意象进行极其个性化的历史考据和联想，解读的重心从品味诗歌本身的意境，转移到了对背后本事的考证和猜谜上。文本不再是欣赏的对象，而是沦为等待破译的密码，文学作为审美文本的意义大幅削弱。

从以上两点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吴淇之前的这种模式，不是“抛开”文本，而是在“征服”文本。它让文本臣服于阐释者的主观“己意”或外部历史考据，破坏了诗歌作为独立艺术品的内在完整性与美感。而吴淇明确批判了将“志”与“意”割裂，并以己意穿凿附会的流弊，不留情地指出“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也几何矣。”实现了从“以我之意，猜诗人之志”到“以诗之意，求诗人之志”的方法论转向。

（二）清代考据：对文本的不同利用

文学理论发展至清一朝，上述流弊有所改观，而清朝显学在于考据学与训诂学，其同样对于文学文本十分重视，但与吴淇二者方向显然不同。吴淇旨在通过文本，探寻古人之志，与古人进行一场精神的对话。他追求的是理解陶渊明为何“悠然”，杜甫为何“沉郁”。这是一种向内的、指向心灵和艺术的探索。考据学与训诂学旨在通过文本，解决一个具体的历史或语言学问题。他们追求的是某个字在古代的正确读音和含义，某个典故的最早出处，某段历史记载的真伪。这是一种向外的、指向客观知识的探索。二者具体研究方法虽然都指向文本本身，但亦大不相同。吴淇的方法是综合的、体验式的，要求对诗歌意境和诗人心态的整体把握。考据学的方法是分析的、实证性的。他们对文本的“细”，是语言学和解经学层面的精细。因此，笔者愿意将二者的关系理解为“同心不同路”：他们都反对宋明理学末流空谈心性，以“己意”妄解经典的学风，都追求学术的严谨性和客观性。但吴淇走向了“文学性的文本中心主义”，他的严谨在于对文本艺术性的忠实。考据学派则走向了“历史性的文献中心主义”，他们的严谨在于对文本事实性的忠实。因此，我们可以说吴淇在清代学术生态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吸收了时代注重实证的精神，却将其创造性地应用于文学批评领域，而非历史考据领域。他的工作，是为文学建立科学的研究方法，而考据学派的工作，是为经史建立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正是吴淇在中国文论史上卓尔不群、能与后世形式文论对话的关键所在。

（三）吴淇的革新：作为中间环节的“古人之意”

吴淇提出“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其革命性在于将阐释的起点和路径，从外部拉回内部，他要阐释者必须首先“沉浸”到文本内部，去感受、归纳、分析那个由诗歌本身的文辞、声律、结构所生成的“古人之意”。这是一个客观的、受文本约束的审美体验。由此，他确立了文本的权威地位，“意”不再是读者随意的“私意”，而是“古人之意”。这意味着，文本被视为作者情感与思想最可靠的物质性留存，具有了阐释者的优先权和权威性。若想探寻了解古人之志，那就必须踏严格遵循着“古人之意”这条唯一的路径去追寻。因此，吴淇对“以意逆志”的全新阐释，是对文本的回归和高度重视，是一次“文本中心主义”的早期觉醒。

（四）吴淇之后：其文本重视理念对后世文论的影响

吴淇的理念并非孤例，它代表了明清时期随着小说戏曲评点等文学形式兴起而愈发强烈的文本自觉意识。他的思想无疑受到同时代学术之风的影响，也或显或潜对后世理论有所启发。后世翁方纲提出“肌理说”，强调“义理”和“文理”，后者即指文字的布置、法度和肌理。他虽然考据习气仍重，但强调从文本的“肌理”入手，这与吴淇从“文辞”探求“意”的思路有内在相通之处，都体现出对文本形式本身的研究兴趣。而桐城派提出的“义法”说，尤其是方苞的“言有物”“言有序”，要求文学文本具备“正当的叙事伦理，高超的叙事技巧”。刘大櫆的“神、气、音节、字句”说，亦将思想内容与具体的文字形式紧密挂钩。刘大櫆认为“神气”不可见，于“音节”求之；“音节”不可准，于“字句”求之。这种由字句、音节等文本形式入手，进而把握文章内在神髓的方法论，与吴淇“以意逆志”的路径惊人的一致。我们以《人问词话》中，王国维论词，虽然吸收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但其根基仍体现了中国文论中的文本细读基因。他提出的“境界”“隔与不隔”，都是直接针对文本所营造的审美世界本身进行评判。他分析“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这正是最精微的文本细读，关注的是单个字在整体意境生成中的关键作用。这种不从道德、本心出发，而纯粹从文本审美效能出发的批评方式，是吴淇“就诗论诗”精神在近代的重新展现。我们没有证据说以上学者之见解确凿参考吴淇“以意逆志”新解中对文本的强调和回归，但至少，后世无数实践反复证明，吴淇在研究“以意逆志”这一古老文论课题时所意识到的文本精神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作为清初学者，他的创新开启了中国古代文论对文本重视的先声。总结而言，吴淇的贡献在于，他在“读者之己意”与“作者之古志”的阐释学僵局中，巧妙地植入了“文本之古意”这一关键性的中间变量。这不仅有效地矫正了此前主观臆断和牵强附会的流弊，更在中国文论史上率先开启了一种基于文本内部证据的、可操作、可检验的批评范式，为其后重视文本肌理、艺术形式的文论思潮奏响了序曲。

代学术之风的影响，也或显或潜对后世理论有所启发。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党校 本文系济宁市党校系统2025年课题项目“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济宁市实践的分析”（项目编号：2025JN31））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党校 本文系济宁市党校系统2025年课题项目“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济宁市实践的分析”（项目编号：2025JN31））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党校 本文系济宁市党校系统2025年课题项目“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济宁市实践的分析”（项目编号：2025JN31））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党校 本文系济宁市党校系统2025年课题项目“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济宁市实践的分析”（项目编号：2025JN31））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党校 本文系济宁市党校系统2025年课题项目“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济宁市实践的分析”（项目编号：2025JN31））

（作者单位：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党校 本文系济宁市党校系统2025年课题项目“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基于济宁市实践的分析”（项目编号：2025JN31））